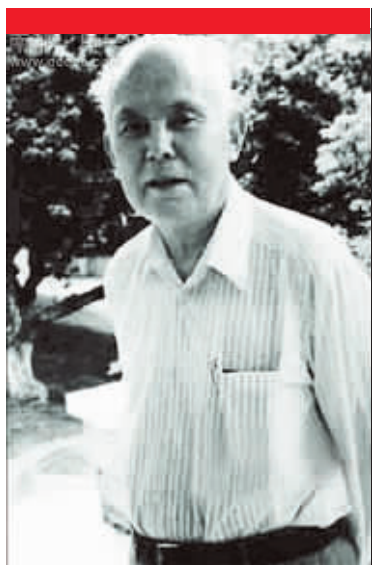


# 最早提出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人

——卓炯



卓炯(1908—1987),中国经济学家。湖南慈利县人。1935年毕业于中山大学,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1941—1946年在中山大学任教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,历任南方大学华侨学院副主任、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职。卓炯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,就提出社会分工决定产品的商品性,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商品的社会性质和特点,根据这个思想,合乎逻辑地得出社会主义仍然是商品经济的科学结论。1961年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“计划商品经济”的理论,而且对此作了充分的论证。后来,经过20多年的理论探索,他创立了具有自己独特见解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体系,这一理论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。

1950年5月,卓炯任南方大学第一部主任。1953年任中共华南分局宣传部学习室副主任,后任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处长,致力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。先后写出《政治经济学学习提要》以及《十大经济政策解说》等专著,提出计划经济的基础是商品经济和商品价值规律。1958年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。1960年,任广东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编写组副组长,在他起草的前言中阐发了物质利益的原则,因而被撤销副组长职务。他执着追求真理,仍把商品经济作为研究的课题。

1961年参加广东省经济学会年会,写了一组关于商品经济的论文。《论商品经济》一文的结论是:“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生产的存亡,而所有制形式只能决定商品生产的社会性质和特点”。这是他的商品经济理论的中心思想,并据此得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点。

卓炯的观点被指责为“修正主义”,受到严厉的批评,连答辩的权利也没有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被扣上“反动学术权威”、“反革命修正主义”的帽子,受到批判和凌辱。1973年,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恢复,他任副所长兼经济研究室主任。

1979年,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成立,他任副院长。他继续致力于商品经济研究,写出《关于〈资本论〉的生命力的探讨》、《政治经济学新探》、《价值规律论》专著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,他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探讨。1979年4月,他向无锡全国学术会议提交《破除产品经济,发展商品经济》的论文。

1980年夏,卓炯写了《把产品经济体制改造成商品经济体制》,明确指出:“当前体制改革的中心问题,要有利于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”。1984年10月,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,他写了《试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》、《试论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理论基础》等论文。1986年,参加在珠海召开的迈向二十一世纪的粤港关系第二次研讨会,他宣读《从“一国两制”的经济基础看粤港关系》的论文,提出两个不等式,即“商品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,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”。卓炯创立的具有自己独特见解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体系,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。

1999年,卓炯著的《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》被推选为“影响新中国建设的十本经济学著作”,成为新中国经济理论发展的十面旗帜之一。■



关键词

慈利人  
“计划商品经济”  
物质利益的原则  
体制改革  
《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》  
十面旗帜

# 最早提出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人

——李昌

李昌,1914年生于湖南永顺县。1933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,1935年入清华大学,参加“一二·九”运动;1936年入党。1982—1985年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;1985—1994年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。

在1980年12月的党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讨论会上,李昌作了“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”的发言。第二天,他又写信给邓小平说,他一直觉得经过十年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灾难之后,党内还有“四人帮”极左的余毒,还有封建主义宗派思想残余等,在这些思想的袭击下,党内外思想有些涣散。在他看来,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总目标,就是“实现四个现代化”,这个目标凡是中国人没有一个不赞成。但是他觉得,在提出“实现四个现代化”的同时,还可以考虑提出“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”的目标。

对“精神文明”的内涵,他认为包括两个部分,一是教育发达、科学昌明和文艺繁荣等实体部分,一是道德、传统、风尚等意识形态部分。前者(实体部分)是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们可以努力推进的,而后者(意识形态部分)则是广大人民都能出力参加建设的。提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同时,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,就是要动员工农商学兵、男女老幼参加这个建设,从而把广大人民的思想集中到一个明确的革命的爱国主义目标上,更有力地推进四个现代化的工作。

邓小平对此颇为重视,在会议的讲话中,邓小平谈到了“建设精神文明”的问题:“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,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,而且要有高度

的精神文明。所谓精神文明,不但是指教育、科学、文化,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、理想、信念、道德、纪律,革命的立场和原则,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,等等。”与会者也都赞同和响应这个建议。

会后不久,1981年第三期《半月谈》杂志刊登了李昌的信,并配发编者按,呼吁读者阅读、思考,就“建设精神文明”问题“踊跃发表”自己的见解、想法和建议。

杂志出刊当日,即2月10日,中共中央机关报《人民日报》报道了这个消息,全文转载了李昌的信和《半月谈》的编者按。

此后,“建设精神文明”多次成为中共高层讨论的议题,并写入文件。1981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,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报告,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,都重申了“建设精神文明”的任务。“精神文明”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家喻户晓、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词汇。

及至1986年9月,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专门通过关于“建设精神文明”的决议。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关于“精神文明”问题的文件,规定了“精神文明”建设的内涵和目标、途径。文件将“精神文明”解释为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两个方面,显然是采纳了李昌的概括;而其中若隐若现贯穿的爱国主义旗帜,也是李昌在信中明确表达的目标。■



关键词

“社会主义精神文明”  
四个现代化  
邓小平  
家喻户晓  
爱国主义旗帜